



革命文学的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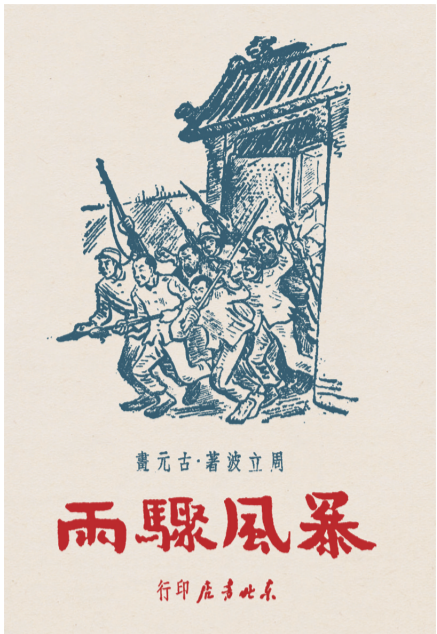
□贾寒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革命的进步文学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总结其中的经验，以启迪今天的文学创作，十分必要。周立波创作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正是这样一部在革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这部作品于1948年出版后，立刻引起热烈反响，从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持续产生影响的红色经典作品。

一、《讲话》指引下的思想转变

周立波是一位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出身于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其后又奔赴延安，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艺和文学创作。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向。包括周立波在内的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心灵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同时也在创作上开始做新的准备。周立波在《谈思想感情的变化》一文中写道：“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个穷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在革命环境里的时间也很长了，按道理说，我的思想感情应该比较接近工农兵，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要少一些吧，但在事实上，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的灰尘的不时侵袭，由于在旧式学校里养成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积习，而小资产阶级的下面这句话：‘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是很适用于我的思想情况的。”深刻的自我剖析，让周立波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自觉要求从思想进行转变。“我从理性上认识了自己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的倾向，很想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长期地锻炼自己”。周立波认真贯彻了



《讲话》精神，反思了自己的创作立场和方式，并迫切地想要进行改造，深入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1944年9月，为了与工农兵结合，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周立波积极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的支队，随军南征。在《讲话》之前，周立波也曾深入前线和农村，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还是一种“做客”姿态，和群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自然而然地退居客人的地位。在前线不曾主动了解战士们生活和情感，因而写不出伟大的场面和英雄形象。在乡下也没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生活和劳动不够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经过思想的蜕变，重焕新生。在一年多的行军生涯中，他自己扛背包，在枪林弹雨中用双脚徒步走完了七个省的战场，经受了各种艰苦惊险的考验和锻炼，被誉为“钢铁的文艺战士”。在这种紧张的生死斗争里，他切身体会到了武装斗争的艰苦和激烈，目击了钢铁般的战士为了祖国的解放英勇牺牲，他也真正地把自己与每一名战士紧紧联系在一起。周立波已经明白如何更好地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这也为之后的文学创作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积极投身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观察、学习，积累素材，把创作的目标聚集于革命斗争和工农大众的现实生活，周立波的文学理想和创作追求因为《讲话》而发生根本改变。可以说，从1942年聆听《讲话》，到1948年《暴风骤雨》

出版，这其间的几年时间，周立波经历了学习、思考、积累并终于在创作上爆发的过程。《暴风骤雨》既是对新的文艺政策的积极回应，也是周立波本人艺术观的真诚展现，达到了政策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一经出版便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深入生活的丰富积累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落实《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号召“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周立波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土地改革的伟大群众运动中。同年10月，周立波来到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参加土改工作。《暴风骤雨》里，故事发生地元茂屯就来源于元宝镇。长期以来，当地农民遭受日寇、伪满和地主的欺压，食不果腹，生活异常凄苦。

在此之前，也曾有工作队来这里开展土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出现了“夹生饭”现象。周立波深入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所思所想。采取探贫访苦、扎根串联的方法，访问贫雇农，与他们同吃同住。冬季的农闲时节，大伙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举行“唠嗑会”，周立波几乎每天都去，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甘做小学生，虚心向农民请教，不懂就问，大家都愿意亲近他，在这样的闲聊中周立波克服了语言障碍，还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同时也了解到当地的风土人情，逐渐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在访问贫雇农的过程中，周立波也结交了很多朋友，比如主动负责周立波安保工作的“跑腿子”花玉容，逐步觉醒成长起来的农民积极分子郭长兴，周立波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些鲜活的人物也成为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时塑造经典人物的原型。

经过前期的走访，大部分贫雇农被发动起来了，为了让群众进一步解党的政策，周立波在元宝镇举办了培训班，培训班以东北局宣传部编写的《农村政治课本》为主要教材，结合讲毛主席、八路军的故事，白毛女、吴满有的故事和《李有才板话》等，通过学习大家了解到党的政策和土改的任务，并学以致用通过在可靠的贫雇农家“栽槐树”的办法，大家时常聚在一起商量翻身的事儿。周立波非常善于观察，正如他所说“我们熟悉人，要涉及他的工作、生活、家

庭、性格和经历等等各个方面，要事事注意，处处留心，不但要观察得广，而且要挖掘得深，体味得细。”（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他的细致入微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提供了帮助，也为之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周立波和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发动群众，挖穷根、挖臭根、挖坏根，肃清了混进队伍的坏分子，打垮了地主势力，并给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避免了“夹生饭”的现象，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周立波始终按照《讲话》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站在了为工农兵服务的队伍里，并谦虚地向他们请教学习，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真正地融入了农民的生活。深入生活的经历，让周立波对这片土地和群众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同时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三、潜心创作的重要收获

通过深刻的思想改造和深入生活，周立波已经摒弃了小资产阶级固有的弱点和不足，真挚且坚定地高举“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想。周立波把深入农村时所经历的事件和熟悉的人物都深深刻在了心上。回到报社工作后，他的内心难以平静，脑海中经常闪现元宝区参加土改运动的场景，运动中激烈斗争的情形历历在目，创作的欲望异常强烈，在工作之余，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构思、创作反映东北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仅用50多天的时间就写完了《暴风骤雨》上卷的初稿，但是他却觉得不够深刻，缺乏生活素材。根据省委的意见，周立波到周家岗去继续深入生活，这里是省委进行土地改革的重点村，也是工作成绩突出的模范村，小说中“三斗韩老六”就是取材于发生在此地的“七斗王把头”。周立波带着《暴风骤雨》的初稿来到这里。在这里一住又是四个月，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这里修改完了上卷18万字的文章，与他同去的版画家古元还为小说设计了插画。

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为了进行创作周立波采取了点点结合的方法体验生活，除了在元宝镇和周家岗，周立波还曾到拉林、苇河、呼兰等地。

“在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较长的时期以后，又到同类地区去走走。这样会使你的生活见闻更丰富，会添加你的材料库里原来没有的东西，并对已经见过的人物和事件加深认识，所以书中角色的原型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物，而是很多人物

邢野与《平原游击队》

□姚明

1939年5月，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大部分师生、延安工人学校组成了“华北联合大学”，7月，华北联合大学决定由陕北公学剧团和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学员组成华北联大文工团，开赴晋察冀边区，邢野在华北联大文工团，从事话剧、歌剧、秧歌剧的创作、导演、编剧、演剧生涯。在抗战的大潮中、在革命精神的洗礼下，邢野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独创或与战友合作写了不少剧作，如秧歌剧《反扫荡》《过新年》、话剧《粮食》《村长》、独幕剧《出发之前》《不卖给敌人粮食》等、歌剧《大生产》《天下第一军》、梆子剧《无人区》，也作为话剧演员参演了很多剧目，如《白毛女》中出演过杨白劳，在高尔基的《母亲》、果戈理的《巡按使》中充当配角，在《三八妇女节活报》扮演封建魔王，身披铠甲，手执长鞭，与陈强扮演的军阀军帽、腰横倭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针锋相对，在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的演出中取得强烈反响。因为其卓越的创作能力，由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副队长、社长，任至冀晋军区文工团团长，后改称察哈尔军区文工团。

1952年，邢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所务委员、秘书处主任，同时也是演员，在此期间创作了多幕话剧《游击队长》，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诞生，与丁玲的发现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丁玲看过他的话剧剧本《游击队长》，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1954年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创作所将《游击队长》改成电影《平原游击队》。电影讲述了1943年秋天侵略我国的日寇向我冀中抗日根据地河北省定县发动了罪恶的“扫荡”，根据地的军队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展开了反“扫荡”的斗争。这时候，我游击队长李向阳接到了军分区司令给他的任务：带领游击队深入敌后平原地区的一个县城，牵制住驻扎在定县城的日寇松井中队长的部队，不让他进山区增援，减轻敌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同时要保住坚强的县城附近李庄的公粮。李向阳的游击队分成两队，深入敌后。一队由参谋长钱大友率领，一队由李向阳率领。钱大友的队伍到了敌后，到处散布消息说李向阳游击队下山了，来迷惑敌人。李向阳的一队深夜来到李庄，会见了我地下区委书记孟寿同志，他们研究了如何来牵制敌人和保护公粮。当天深夜，日寇松井中队也在思索怎样带着粮食进去增援，突然四面八方传来李向阳带队下山的消息。他得到李庄反动地主杨老宗送来的

情报，便带队前往李庄。转入地道作战的李向阳暗中攻击日寇，并派人烧毁李庄附近的炮楼，但松井依然坚守李庄。汉奸献计，日军找到了地道口。为了解救群众，李向阳率人进城，大闹敌后。狡猾的松井不离李庄，并把群众从地道里赶出来，拷问群众李向阳的去向，并想得到坚壁在李庄的粮食。为了将松井调出李庄，李向阳组织游击队攻城，松井为保城被迫撤退。李向阳又一次化装进城，烧了敌人的粮食，处死了汉奸杨老宗。气急败坏的松井再次杀进李庄，这一次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日军被全歼。

1954年，《平原游击队》摄制组包括演员郭振清、安震江、葛存壮、柏瑞桐、张巨光、贺汝瑜、李万城等一行人，来到河北保定市清苑县的冉庄体验生活，在这里他们与曾经跟日寇进行过生死搏斗的乡亲们一起生活、劳动、交谈，熟悉当时的环境、人物与生活，获取第一手生活资料，为李向阳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电影上映后，邢野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从1956年到60年代初，因为《平原游击队》而小有名声的邢野又相继发表了话剧《青年侦察员》；独幕剧《无孔不入》《塞北红旗》；儿童诗剧《王小放牛郎》；与谷谷、孙福田合作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与诗人田间合作多幕歌剧《石不烂》等相继发表。电影《平原游击队》，既是邢野的创作高峰，也是他创作式微的开始。1960年初邢野患了严重的胃病，体重降到了85斤，三四年时间基本上在家休息，练练书法，1963年以后，除了零星发表一两首诗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品了。据其儿子回忆“记得那时看到的父亲，除了练习书法，就是整天沉默不语地抽烟”。

“文革”中时任电影局电影指导委员会成员的江青让剧作家阿甲修改电影《平原游击队》准备拍成彩色电影，并提出要把电影剧本再改成京剧剧本。当时阿甲找到邢野，向他取经，并请他把“李向阳”的生活原型介绍给他，进而深入采访积累素材进行修改。邢野就给阿甲写了介绍信，找到了“李向阳”的生活原型甄凤山，甄凤山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当时的斗争生活都和阿甲谈了，阿甲抓住“甄凤山要跟日本鬼子中队交换媳妇”一个情节，作为修改剧本的一个重要支柱，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是：鬼子既打不垮甄凤山，又不能使他投降，就想了个邪招儿，趁甄不在家之机，捉走了甄的妻子，并给甄写信，说你



要是投降就放了你老婆，否则就杀了她。甄凤山决定以牙还牙，带人进了城，趁日军中队长不在家，到了“白面”馆，从墙这边凿了个窟窿，进去把日军中队长的媳妇“掏”了出来。阿甲认为这个材料有意思，就写进了修改本中，江青看到修改本中的这个情节后大怒，认为“这是污辱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就不让阿甲继续修改了。之后江青这才又指派邢野、贺敬之、崔嵬、冯志、李英儒五个人共同讨论修改这个电影剧本，周巍峙担任组长，主要负责生活问题，林默涵领导他们修改剧本。

之后，江青让诗人张永枚把《平原游击队》改成京剧，张永枚的京剧《平原作战》没有写好，上演的京剧《平原作战》剧本是崔嵬改编的。1974年，长影厂重拍彩色版《平原游击队》，用的是张永枚的修改剧本，导演是曾在老片中担任副导演的武兆堤，郭振清再次申请饰演李向阳，当时报名的有20多人，包括《小兵张嘎》中嘎子的扮演者安吉斯，最终，郭振清因年龄偏大，安吉斯因个头偏矮被淘汰，扮演者是更符合当时高大上审美要求的李铁军。除此之外，长影对于李向阳这一角色格外重视，花费了不少力气进行全国海选，其中吕晓禾被那位女旗手嫌其“嘴大”这个荒诞理由被否；已选定的石维坚因到原单位外调不通过而放弃。整部影片除了老鬼子方化饰演的松井之外，所有的角色都换了人，粉碎“四人帮”后就不上演了。



就是在筹拍这部电影的同时，一部根据《平原游击队》改编的京剧《平原作战》已经被搬上了舞台，由中国京剧团编排，剧中主人公的名字不再叫李向阳，鬼子中队长的名字也不再叫松井，但观众可能对老片太情有独钟了，仍念念不忘老版中那简洁而朴实的旋律。而观众最感兴趣的的老版中那段《鬼子进村》也许是无可替代的，在新版中，作曲家无疑是煞费苦心创作了一个新的旋律，日本民间风味也极其浓厚，但相比之下还是缺乏个性，最终没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无论是新上演的电影《平原游击队》还是京剧《平原作战》，都与邢野没关系了。

“文革”之后，饱经沧桑的邢野声明再不写东西了，随着时间进入1990年代，电视连续剧成为流行文化的“主菜”，一些过去家喻户晓的老电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和长篇小说《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等，几乎都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这也隐约触动了邢野的内心深处的情怀，2002年，一个文化公司与病重的邢野取得联系，想把电影《平原游击队》改成电视连续剧，争取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上演。并让其弟代表他与那个文化公司签了合同，合同签了以后，他天天都在思考剧本的纲目，调动他在敌后游击时期所有的生活积累，将原来的电影故事尽可能地丰富起来，经常夜里睡不着了，想起一点什么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来。然而他已经84岁高龄，并患有高血压、脑血管，数次中风、血栓，经历多次抢救，2004年带着《平原游击队》未能改编为电视剧的遗憾与世长辞，终年86岁。